

中国最早的莎评

阮 琨

近年来,国内报刊上以“莎士比亚在中国”或“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”为题的文章,都正确地指出“首先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外国传教士”,但有人以严复在其翻译作品《天演论》和《群学肄言》中提到莎士比亚作为起点,认为“中国学者介绍莎士比亚始于19世纪90年代”,则与史实不符。还有些研究者把梁启超的一则诗话看做是我国最早的莎评,其实不然。梁启超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之八中,曾简略地谈到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。他说:“近世诗家,如莎士比亚、弥儿敦、田尼逊等,其诗动亦数万言。伟哉!勿论文藻,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。”这则诗话原载《新民丛报》1902年5月号,见〔日〕下河边半五郎编《壬寅新民丛报汇编》,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出版,第910页。梁启超在诗话里只是笼统地把莎士比亚等近世诗家介绍给读者,并没有仔细评议他们的诗,更没有专门对莎士比亚进行论述。“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”这句话中的“气魄”指的是莎、弥、田等人的诗“动亦数万言”。如此洋洋洒洒的华章,他认为,可以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相媲美。说到底,他只是谈一般的印象,并未涉及几位近世诗家的作品的内容。他说“勿论文藻”,实际上是他不可能就“文藻”问题发表议论。原因很简单,因为他根本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。他在上述诗话中直言无隐地作了这样的补充:“荷、莎、弥、田诸家之作,余未能读,不敢妄下比譬。”因此,严格说来,梁启超的这则诗话,不能看做是正式的莎评。

从时间上来说,梁启超也不是我国评论莎士比亚的第一人。他的这则诗话是在本世纪初发表的,比我国正式莎评的提出晚20多年。

近读郭嵩焘著《出使英法日记》(钟叔河据湖南省图书馆藏郭氏日记手稿整理成书,题名为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,并将此书收入《走向世界丛书》,岳麓书社1984年版),发现书中有好几处谈到莎士比亚,特别是光绪四年(1878年)旧历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:

“……是夕,马格里邀赴来西恩阿摩戏馆,观所演舍克斯毕尔戏文,专主装点情节,不尚炫耀。其戏馆新创成,世爵夫人百尔代得顾兹捐资为之者也。”(按:舍克斯毕尔即莎士比亚)

郭嵩焘(1818—1891),湖南湘阳人,于1876至1879年间任“出使英国钦差大臣”,兼使法国,是清朝政府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任中国外交官。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认为,郭氏在伦敦观看莎士比亚戏剧后写的这则日记是中国最早的莎评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郭氏对莎剧所作的“专主装点情节,不尚炫耀”的评价,与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迪南·拉萨尔的信中强调指出的“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”(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29卷,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,第583页),基本观点是一致的,可谓中西所见略同。鉴于郭嵩焘的简要而精辟的莎评迄今尚未被人注意,特转录于此作为莎学史料的补遗,公诸同好。

下面,顺便提一下我国最早的诗体莎评。1904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英国散文家查理士·兰姆和他的姊姊玛丽·兰姆改写的《莎士比亚故事集》,书名改为《英国诗人吟边燕语》。翌年,汪笑侬在读译书所收二十则莎剧故事后,作成二十首七言绝句——《题〈英国诗人吟边燕语〉廿首》,登载在《大陆》第三年第一号(即三卷一期)上,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发行。这在我国莎学史上是最早的也是罕见的用旧诗体写成的莎评。汪笑侬(1858—1918),满人,原名德克金,其经历与莎士比亚大体相似,既当过演员,又是剧作家。不同的是莎士比亚终生都是布衣,终生都从事戏剧创作活动,汪笑侬则当过知县,被弹劾离职后方转入戏剧界。不用说,莎翁在戏剧创作上的造诣和声誉,汪氏是不可能企及的。他自己也在题诗后记中承认:“以浅陋薄弱之词……绝不敢谓握题珠而涵盖一切也。”但他毕竟是一个行家,吟咏之间,他对莎剧的义蕴还是作出了一些恰当的阐释。二十首七绝中不乏佳什。如:

第七首《蛊征》(《麦克白斯》)

妖妇何来言咄咄,无端蛊惑乱君臣。

一朝树走将军至,不及班家有后人。

第二十首《颶引》(《暴风雨》)

顺风不及颶风好,吹散人间万种愁。

多谢封家狂婢子,撮成婚媾解讐仇。

汪笑侬在后记中仍以诗坛咏主之一的口吻说:“古人曰,不有佳作,何伸雅怀。薄海诸大吟坛亦其同此情感乎?”这几句话正好用作本文的结束语。